

中国能源企业 海外投资研究

翟玉胜 周文娟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能源企业 海外投资研究

翟玉胜 周文娟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研究/翟玉胜,周文娟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307-17768-0

I. 中… II. ①翟… ②周… III. 能源工业—工业企业—海外投资—研究—中国 IV. F42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3360 号

责任编辑:胡 荣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韩闻锦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31 字数:444 千字 插页:1

版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7768-0 定价:65.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　　言

能源，以其独特的战略性特质，影响着国际经济的活力、世界政治的稳定以及全球居住的环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能源清洁化和地缘政治都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能源消费中心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亚太国家的市场地位快速提升。以美国页岩气为代表的非常规油气发展和伊朗重返国际油气市场，使得北非、东非、西亚、中亚等传统能源生产国“向东看”的趋势将进一步固化。中国能源消费体量和发展美好前景，将利于取得世界能源格局变革的优势地位。

世界能源结构性革命和化石能源价格整体跌落，是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必须面对的全新环境。从能源消费结构来看，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传统能源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因此，中国就存在着石油天然气供给不足和煤炭生产能力过剩的现实矛盾。这些现实矛盾，又必然使中国处于油气进口的依赖性和煤炭清洁技术改善的复杂局面之中，由此引发能源供应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在各种应对矛盾和挑战的预案中，能源企业“走出去”配置国内外两种资源、发挥国内外两个市场作用是重点方案之一。从能源企业海外投资 20 多年发展历史来看，过去能源企业海外投资遭遇了区域风险频发、溢价问题突出和国企审查危机等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既有企业内部因素，又有国有资本管理制度的因素。因此，我们需要从投资区域、投资模式到风险防控进行制度重构。

本书研究特色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本书运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风险管理与能源政治的理论，研究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的模式与风险管理问题。阐述在化石能源

价格持续低迷、能源结构持续调整之际，中国能源企业的海外投资必然从高风险区域向“一带一路”区域集聚，逐步形成“一带一路”能源供给国、消费国和过境国的能源产业生态链；以能源通道为纽带，实现资源、资本、技术、产业、市场等要素的有效融合。

本书运用理论模型推导能源投资模式的选择过程，阐述能源企业海外投资模式的影响因素和实施方式、发展规律。建议中国能源企业从资源获得型投资和单点式投资向全产业合作型投资和“链式投资”升级；以中国资本和市场为基础，逐渐建立技术服务、工程建设和装备制造业务的产业链协同投资模式。

本书从投资模式与区位选择、风险因素相关视角，对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的共性风险、能源通道风险进行分析与归纳。认识到中国能源投资密集地区频发地缘政治风险，在能源价格长期低位运行环境下海外资产风险敞口扩大，将损害能源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建议能源企业海外投资以“一带一路”战略为指引，与资源国、国际能源公司等多方合作，以非股权投资模式为主导，形成以市场与技术优势为支撑的降低国有体制性运营风险和政治风险的国际竞争力。

现有文献对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的研究成果还比较零散，尚未能形成统一的研究框架和理论范式。而能源企业海外投资的战略动机、区域评价、模式选择和风险因素是密切联系的整体，碎片式研究可能会导致结果与事实相差遥远。因此，本书尝试运用综合范式的研究框架，将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作为海外投资研究的对象，将海外投资模式与风险管理联系起来思考，目标是在为能源海外投资研究拓展一个新的空间。

也期待本书为能源政策，以及制定者、能源企业管理者和能源经济发展的关注者提供一点有价值的帮助。由于我们知识与经验的局限，书中还有诸多尚未完善的空间，敬请读者谅解与指正！

笔者

2016.2

目 录

| | |
|----------------------------------|-----|
| 第一章 绪论 | 1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1 |
| 二、海外投资国内外研究述评..... | 4 |
| 三、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55 |
|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点 | 57 |
| |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61 |
| 一、概念界定 | 61 |
| 二、基础理论 | 65 |
| 三、能源安全理论与能源地缘政治学的理解 | 86 |
| | |
| 第三章 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的环境变迁 | 95 |
| 一、国际能源格局与中国能源需求趋势 | 95 |
| 二、世界能源环境变迁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 | 141 |
| | |
| 第四章 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现状评价 | 150 |
| 一、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总体描述..... | 151 |
| 二、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的问题与原因..... | 189 |
| | |
| 第五章 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的区域研究 | 203 |
| 一、石油天然气投资区域分析..... | 206 |
| 二、中国煤炭企业海外投资区域研究..... | 223 |
| 三、煤炭企业海外投资的发展空间..... | 230 |
| 四、“一带一路” 投资区域分析 | 238 |

| | |
|--------------------------------------|-----|
| 第六章 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模式 | 248 |
| 一、海外投资模式的简单分类 | 248 |
| 二、能源企业海外投资进入模式通用类型 | 251 |
| 三、能源企业海外投资模式的特殊类型 | 257 |
| 四、煤炭企业海外投资模式 | 273 |
| 五、能源企业海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发展规律 | 278 |
| 六、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模式的理论研究 | 288 |
| 七、兖煤澳洲投资模式案例分析 | 294 |
| 第七章 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识别与评价 | 310 |
| 一、能源企业海外投资的非经济风险识别 | 311 |
| 二、能源企业经济风险识别 | 327 |
| 三、能源企业内部风险识别 | 329 |
| 四、能源通道风险分析——以地缘政治视角 | 333 |
| 五、能源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评价——南苏丹石油投资 的风险管理案例研究 | 354 |
| 六、能源企业海外投资风险控制——以中石油风险控制 为例 | 364 |
| 第八章 能源企业海外投资的法律与制度保证 | 369 |
| 一、海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基础观 | 369 |
| 二、能源海外投资法律与制度保护——基于政府主体 视角 | 372 |
| 三、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基于 BIT 和 MIGA 视角 | 387 |
| 四、能源海外直接投资的政治保护 | 395 |
| 五、以澳大利亚为例的能源企业海外投资审查制度 | 398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和展望 | 411 |
| 一、研究结论 | 411 |
| 二、政策建议 | 419 |

| | |
|----------------------|-----|
| 附录 中国能源企业投资项目概述..... | 435 |
| 参考文献..... | 480 |
| 后记..... | 486 |

第一章 絮 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能源独特的战略属性，影响着国际经济的活力、世界地缘政治的稳定以及全球环境的未来。自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国家能源结构调整经历了从传统柴薪能源到以煤为主的能源，再到石油和天然气主导的时代。回首历史，古代强大帝国的兴亡都与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相关。古埃及开发尼罗河、罗马帝国使用奴隶、蒙古帝国利用马匹等有效地组织能源资源从全国向政治经济中心转移，从而使文明得以发展繁荣。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远洋船只风帆技术使西方殖民主义遍布全球。直到英国使用煤炭以及因采掘煤矿而发明蒸汽机最终打破欧洲国际关系平衡，全球性殖民统治出现了。尽管18世纪中叶石油就被开发出来，但最有效利用石油的美国逐步成为了世界体系的霸主。历史告诉我们，每次能源革命都将导致国际生产方式和政治结构发生变革。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能源供给格局和地缘政治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油气消费“东进”和能源供给“西移”的趋势改写着世界能源、经济乃至地缘政治版图。由于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发达国家对化石能源的需求持续降低，全球能源消费中心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西亚、北非、东非和中亚—俄罗斯等油气生产国“向东看”的趋势将进一步固化。伊朗重返国际油气市场，无疑将加剧市场竞争，使得亚太国家的市场地位进一步提升。中国作为国际能源最主要的消费国之一，具备了世界能源治理格局调整中的优势。与此同时，美国借助页岩气非常规油气开采技术重新塑造世界能源供给中心，在全球经济衰退中触动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剧烈下降。美国从区域石油依

赖关系转向与少数稳定国家的盟友关系，并减少中东“石油供应的负担”，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推动与地区盟友及伙伴的军事联盟，靠近和拉拢中国周边国家，签订具有排他性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世界能源格局变化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变化，迫使中国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史丹，2010）^①。

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也在改变，能源消费清洁化日益明显。美国在2020年前实现由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过渡。欧盟把限制全球气候变暖、减排提效、推广可再生能源等多个目标纳入“20—20—20方案”。而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次能源消费仍然占据主体地位。我国煤炭和水力资源人均拥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左右。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持续高涨，煤炭粗放发展方式下生态环境承载达到了极值。石油天然气供给不足和煤炭生产能力过剩的现实矛盾，必将增加能源安全和生态可持续的风险。2013年，中国对外投资达1010亿美元，仅居美国、日本之后，为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中国必须“走出去”，渐进式改变国际经济规则是国内发展的诉求（李稻葵，2015）^②。供给侧改革亟待能源企业实现国际产能合作。能源企业海外投资是最重要的国际合作领域，也是促进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重要路径。欧美能源公司的油气储量、产量、炼油能力和营业收入的50%以上均来自海外，对外资本支出和员工比例接近60%。近年来，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增强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竞争力。但是能源企业海外投资模式与风险管理问题日益突出，腐败案件接连发生。政府与社会都关注能源企业的改革，希望能源企业实现供给、效率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也要完善海外投资风险预警机制。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渐次推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战略意图的关注和国内企业对海外生存的关注交织

① 史丹.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能源的发展态势、问题及对策 [J]. 中外能源, 2010, 15 (6): 1-11.

② 李稻葵. 中国必须走出去 力发出击改变国际经济规则（原标题：迎接“中国时刻”：渐进式改变国际规则是国内发展的诉求） [EB/OL]. [2015-09-15]. 凤凰国际智库,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916/22/2289804_499617301.shtml.

形成了舆情图谱。以经济合作为先行力来推进国际产能合作、逐步带动和整合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协作。在推动“一带一路”贸易伙伴的工业化进程中实现能源资源和运输通道的多元化，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因此，研究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是十分迫切的、富有战略意义的课题。其意义在于：

（一）有利于能源企业发展战略的调整和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形成

根据全球能源革命的情势变迁，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战略全面实施。2015年3月28日中国政府正式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其中如何落实国家总体部署，找准与沿线国家利益交汇点，促进中国产业国际转移、推进与相关经济体投资合作成为关键。由于能源的高度敏感性和现行能源利益博弈的复杂性，寻求中国能源安全与能源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制度安排，是目前中央政府和社会各界期待取得突破的课题。在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国企业“走出去”，一批优秀的国内企业在资本过剩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意愿强烈的共同驱动下，以增强国际控制权和争取国际产业生态链上游地位的意愿和动力逐渐呈现出越发迫切的趋势。在这样的趋势背景之下，研究能源企业海外投资的模式与风险，将提升中国企业国际合作水平，增强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有利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依据国际投资学相关理论，中国企业“走出去”将存在着国情不同、制度不同和发展阶段不同的困惑。我们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国际投资学、风险管理理论和能源政治等基本理论，对投资模式决定因素、投资方式和风险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开展能源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类型、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价，建立了投资模式与风险防范的联动性思考框架，突出中国国有企业特殊性的因

素。这样的研究方式，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形成系统性、指导性的理论价值，为完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理论奠定基础。

二、海外投资国内外研究述评

(一)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现有海外投资研究主要基于两个视角：其一，投资动机的分析。不同的投资动机导致不同的投资区域和投资模式，进而决定不同的投资风险；其二，投资风险及风险应对措施，海外投资行为直接影响东道国的就业、税收和文化，面临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的综合风险；规避投资风险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关注点所在。

1. 海外投资动机和管理行为分析

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海外投资领域进行深入研究。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学者Hymer在其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先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①具备东道国同类企业所没有的特定优势即垄断优势，对外直接投资可赚取比国内投资更高的利润。企业特有垄断优势的获得和维持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才有可能实现。海默^②注意到美国资本面临的是一个寡占市场，美国寡头与欧洲寡头之间很难实现所有权优势转让的交易，所以美国寡头采取对外直接投资建立全资子公司的方式，将所有权优势在企业内部转让。并认为只有在对外投资收益大于固守本国市场收益时，才有动机实施对外投资(Knickerbocker, 1973^③)。垄断优势论基本上符合美国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海外扩张的主要特征，只适用于解释美国大型垄断企业的

^① Stephen Herbert Hymer.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D]. Doctoral Dissertation,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60.

^② Stephen Herbert Hymer.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M]. Cambridge: MIT Press, 1976.

^③ Knickerbocker F T. Oligopolistic Reaction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该理论还可以较好地解释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并为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陈漓高等，2009）①。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农（Raymond Vernon, 1966）②认为国际寡占行为理论揭示美国不断向国外转移已在国内丧失优势的产业，从而创新产品以维持产业的垄断或寡占优势。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与产品的生命周期有密切的联系，产品生命周期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与区位的选择。国际寡占行为理论和周期理论关于投资模式在于寻求低生产成本地区和产品出口方式的替代的观点有悖于中国能源投资现象，也不能揭示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行为动机。

内部化理论学者认为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通过将中间产品交易内部化，即把本来在海外市场交易的中间产品业务转变为在跨国公司所属企业之间进行，以维持企业的垄断优势和较低的交易成本（Buckley and Casson, 1976③；Rugman A. M. , 1981④）。内部化理论从中间产品的特性来论证外部市场的失效，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其关注对外投资的实质不在于资本的国际转移，而是企业在所有权基础上的管理权的扩张。该理论无法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向和区位选择。

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John H. Dunning）在对垄断优势论和内部化理论进行了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国际生产折衷论。

① 陈漓高等.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环境与战略研究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

② Raymond Vern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 1966.

③ Buckley P. J. and Casson. M. C. The Future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76.

④ Rugman A. M. Inside the Multinationals: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l Markets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Dunning (1981)^① 认为跨国公司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应满足三个基本条件：所有权优势（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Dunning (1998)^② 最先将海外投资的动机分为资源攫取型、市场攫取型、效率追求型和战略投资型四类。同时证明在不同国家吸引海外投资的因素或者影响境外投资的动机也存在差异性的特征。

日本小岛清 (Kiyoshi Kojima, 1977)^③ 认为海默的垄断优势论建立在微观经济理论基础上，强调企业内部垄断优势对海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忽略了国际分工中比较成本原理的作用。国内处于比较劣势（即边际产业）在国外却是比较优势的部门，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向国外转移，依靠投资国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与东道国廉价的劳动力等区位优势结合起来，从而在东道国就能够形成比较优势。这样将使原产业的比较优势能够长时间地延伸下去，由此形成更加良性化的产业发展模式。因此具有比较优势或者寻求比较优势的企业都可以进行跨国经营，从理论上扩大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基础。小岛清将对外投资行为划分为资源导向型、劳动力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和生产要素导向型等。内部化理论和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比较优势理论）为能源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了理论支持，尤其为中国国际产能合作和内部管理提供了基本方向。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为基础的海外投资研究才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威尔斯 (L. T. Wells)^④ 的小规模技术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垄

① John H. Dunn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M]. London: Allen & Unwin, 1981.

② Dunning, J. H. The Eclec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 Restatement and Some Possible Extension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 19 (1): 1-31.

③ [日] 小岛清. 对外直接投资论 [M]. 东京: 日本钻石出版社, 1977.

④ Wells, Louis T.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The Ris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3.

断优势的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英国经济学家拉奥 (Lall Sanjaya)^① 技术地方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引进技术后进行适当的技术消化、吸收和创新, 可以使其产品比发达国家的产品更具有竞争优势。Cantwell & Tolentino (1987)^② 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学习型技术累积和国际投资深化是相辅相成的。

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性, 中国能源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理论只能借鉴和吸收国际上现有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基本原理。中国能源企业与世界发达国家能源企业相比没有“垄断优势”或“绝对竞争优势”, 但与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确实存在勘探开发、炼化技术以及商誉、商标和品牌等无形资产所产生的“比较优势”。并且企业规模经济和资金实力所产生的比较优势, 可以使企业实行上下游一体化而产生的内部化优势。这些对于我们研究能源企业海外投资模式与风险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也是坚持能源企业海外投资最基本的动因之一。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ODI的影响或利用面板数据分析东道国经济水平、自然资源禀赋、市场规模、生产成本等 (Buckley et al., 2007^③; Rodriguez et al., 2011^④; Queretal, 2012^⑤; Hu etal,

^① Lall, S. The New Multinations: The Speed of Third World Enterprises [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83.

^② 转引自陈漓高等.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环境与战略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1.

^③ Buckley P J, Clegg L J, Cross A R,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 (4): 499-518.

^④ Rodriguez C, Bustillo R. A Critical Revision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Chinese Outward Investment: A New Proposal [J]. Panoeconomicus, 2011, 58 (5): 715-733.

^⑤ Quer D, Claver E, Rienda L. Political Risk, Cultural Distance,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Large Chinese Firms [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2, 29 (4): 1089-1104.

2014^①）；或通过大量案例研究中国对外开放政策、战略资源需求等要素的影响（Buckley et al., 2008;^② Gonzalez-Vicente, 2012^③; Zhang et al., 2015^④）。但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对经济要素关注多，对制度和文化考虑较少，尤其是对地区冲突、国际地缘安全因素关注更少。对单边（东道国自然、市场要素）考虑比较多（Tolentino, 2010^⑤），对双边（如与中国产业互补性）尤其是多边影响要素（如已有和潜在的国际竞争）考虑比较少；研究影响要素的一般性规律讨论多（Buckley et al. , 2007^⑥），空间影响差异、区位选择差异问题讨论少；历史数据分析、动因解释多（Rodriguez et al. , 2011^⑦），而缺少面向国家需求的对外投资空间战略研究。这确实是能源企业海外投资进行深度研究需要重视的领域。

2. 投资模式的分析与实证

对于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模式的概念，学者基于一种制度安排进

① 胡鞍钢，马伟，鄢一龙.“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内涵、定位和实现路径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5 (2): 1-10.

② Buckley P J, Cross A R, Tan H, et al. Historic and Emergent Trends in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J].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8, 48 (6): 715-747.

③ Gonzalez-Vicente R. Mapping Chinese Mining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Politics or Market [J]. The China Quarterly, 2012, 209 (3): 35-58.

④ Zhang S, Wang W, Wang L. Review of China's Wind Power Firms Internationalization: Status Quo, Determinants, Prospe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5, 43 (3): 1333-1342.

⑤ Tolentino P E. Home Country Macroeconomic Factors and Outward FDI of China and India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10, 16 (2): 102-120.

⑥ Buckley P J, Clegg L J, Cross A R,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 (4): 499-518.

⑦ Rodriguez C, Bustillo R. A Critical Revision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Chinese Outward Investment: A New Proposal [J]. Panoeconomicus, 2011, 58 (5): 715-733.

行阐述。Root (1994)^① 认为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是一种有制度的安排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即企业在将其工业技术、产品、人员技能、管理经验以及其他自有资源移至国外市场所采取的一种制度安排。Anderson 和 Gatignon (1986)^②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将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定义为企业将自身的控制延伸至海外的一种管理与控制的结构。Kwon 和 Konopa (1992)^③ 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意味着一个企业将其产品转移到海外市场的方式，该模式选择不仅依赖于企业自身的特征及企业产品的特征，还取决于海外市场的特征。Erramilli 和 Rao (1993)^④ 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是企业在组织和管理国际商务交易过程中的一种制度性安排。

对于投资模式的分类，Dikova 和 Witteloostuijn (2007)^⑤ 将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分为进入模式 (Entry Mode) 和建立模式 (Establishment Mode)。前者主要基于海外子公司的所有权性质的角度，将其分为合资 (Joint Venture) 和全资 (Wholly-owned Subsidiary)；后者则基于海外子公司的所有权取得的角度，将其分为绿地投资 (Greenfield) 和跨国并购 (Cross—border M&A)。Pan

^① Root F. R. Entry Strategies for International Markets (the 2nd edition) [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98: 1-29.

^② Anderson E. and Gatignon H. Modes of Foreign Entry: A Transaction Cost Analysis and Proposition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6, 17 (3): 1-26.

^③ Kwon K. C. and Konopa L. J. Impact of Host Country Market Characteristics on the Choice of Foreign Market Entry Mode [J].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1992, 10 (2): 60-76.

^④ Erramilli M. K. and Rao C. P. Service Firms' International Entry-Mode Choice: A Modified Transaction-Cost Analysis Approach [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3, 57 (3): 19-38.

^⑤ Dikova D. and Witteloostuijn A. V.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Mode Choice: Entry and Establishment Mode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 (6): 1013-1033.